



为国而歌

■李 仲

红色记忆

春城昆明的甬道街,曾是清代云贵总督衙门官员的出入通道。岁月变迁,这条老街始终烟火氤氲、熙熙攘攘,有多少达官显贵从此走过,又有多少风云人物留下足迹,早已无从细数。但有一个人的名字,烙印在甬道街的记忆中,在时光长河中恒久闪耀着光芒。他,就是人民音乐家聂耳。

我沿着甬道街慢慢走,在一排老屋中间,看到了“聂耳故居”的匾额,那是一栋被称为“一颗印”的云南传统民居,青瓦覆顶,木窗雕花,尽显斑驳沧桑。聂耳的故事,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

100多年前,聂耳的父亲聂鸿仪从玉溪迁来,租下此处,行医卖药,这座民居挂上了“成春堂”的招牌。1912年2月15日,一个婴儿的啼哭从低矮的二楼传出。家人给他取名聂守信,这就是聂耳的原名。

我迈过故居门槛,屋内光线暗了许多,墙上的大幅照片赫然入目。聂耳,正注视着每一位来访者。讲解员带我们走上木楼梯,脚下吱吱呀呀的声响像是在诉说老屋的过往。“聂耳4岁时父亲病逝,母亲彭寂宽以一己之力扛起全家的生计。这位花腰傩(傣族的一个分支)女子,没上过一天学堂,却凭着聪慧自学医书,成为一名女中医。”讲解员的话语中

满是敬佩。

在聂耳的音乐道路上,母亲无疑是对他影响深远的人。尚在襁褓中时,他便在母亲的哼唱中入睡;稍大一些,他缠着母亲讲故事,母亲总会用玉溪花灯“全十字”或“洋琴调”唱上一段,再接着讲给他听。那些温软的曲调像春城的细雨,润物无声地渗进小聂耳的心底,音乐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。讲解员说:“邻居邱木匠会吹笛子,年幼的聂耳经常去他家听,还拜他为师,学会了吹笛子。于是,母亲挤出钱来,给聂耳买了一支笛子。”故居内,陈列着这支笛子的复制品。在家里、学校以及其他场合,聂耳用这支笛子吹奏美妙的音乐,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。此后,他还学会演奏二胡、三弦和月琴等乐器,上小学时就担任学校“儿童乐队”的指挥。

展板上,一张聂耳中学时期的照片格外醒目:身着格子衬衣,眉目间有着淡淡的文艺气质。彼时的他,已开始系统学习音乐基础理论,练习钢琴与小提琴演奏。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,聂耳的目光怎会只关注琴键与五线谱? 1928年,在革命低潮期,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团,立志“打倒恶社会、建设新社会”。

1930年夏,为躲避反动当局的追捕,聂耳离开昆明去了上海。1931年4月,聂耳报考上海明月歌舞剧社,被录取为小提琴实习生,正式开始他的艺术生涯。他听觉敏锐、才华横溢,被大家亲切地称

为“耳朵先生”,后来索性改名为聂耳。

故居展品中,一把聂耳用过的小提琴(复制品)静静陈列。这把小提琴是聂耳到上海后购买的,在日记中,他曾多次提到它:“愿与此琴终生为伴”“从今年第一天第一时起便不断地努力练习小提琴”。可以说,聂耳音乐上的伟大成就离不开这把小提琴,他的革命征程亦是把这把琴作为精神武器。

伴随着这把小提琴,聂耳迎来丰硕的创作成果。故居展柜中,陈列着不少他的创作手稿(复制品)。驻足细看,泛黄的纸张、模糊的字迹折射出聂耳的生命轨迹。1933年初,聂耳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,与其他左翼音乐工作者一起,创作了大量面向工农大众、反映现实斗争、鼓舞革命斗志的歌曲,《开路先锋》《大路歌》《前进歌》《毕业歌》《铁蹄下的歌女》……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旋律,涌出他的胸膛,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。在给母亲的信中,他表示:“我一向总是抱着一个正当的宗旨:‘我是为社会而生的,我不要再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害我对社会的改造,我要在这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业。’”

1935年2月,田汉刚完成电影《风云儿女》的剧本初稿就被逮捕。面对日益严峻的斗争形势,聂耳主动提出为这部电影的主题歌谱曲。经过不断思索、反复推敲,聂耳对歌词进行了调整,将“我们万众一心,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。前进!前进!前进”修改为:“我们万众一心,冒着敌人的炮火,前进!冒着

敌人的炮火,前进!前进!前进!进!”聂耳曾说:“我写这个曲子时,完全被义勇军的救亡情感激动着,创作的冲动就像潮水一样从思想里涌出来……”

随着电影《风云儿女》上映,主题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迅速传遍大江南北,深受广大军民喜爱,被誉为“中国革命之号角,人民解放之鼙鼓”。聂耳谱写的大量歌曲反映了人民的心声,成为鼓舞人民、教育人民、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和战斗号角,因此引起反动当局对他的仇恨,而要逮捕他。聂耳按照组织的决定离开上海,取道日本赴苏联。不幸的是,1935年夏,聂耳在日本意外溺水离世。

聂耳的生命只有短短的23岁,但他的音乐成为永恒。1949年,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为代国歌。10月1日,开国大典上,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在天安门广场响起。1982年,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确定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。

“起来!不愿做奴隶的人们!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……”歌声在天井里响起,那是一群年轻人在抒发心声。我也不由得加入其中,放声高歌,热泪盈眶。此刻,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每个字仿佛都从乐谱上站起来,激荡起豪情四溢的回响,澎湃着民族复兴的呐喊。这是我们与聂耳的隔空合唱,是我们对先辈的致敬。歌声凝聚着中国人的民族情感,让我们的心同频跳动。

读有所得



进入新时代,改革强军征程如火如荼,人民军队正在经历史诗般波澜壮阔的时代跨越。军旅文学创作不仅要及时反映现实,也要积极介入现实,更要彰显创新创造的时代新质。与之相对应,军旅文学的创作主体、经验形态、传播渠道、评价体系也处于深度调整的过程中。新时代军旅文学正在经历从观念、视域、伦理到格局、方法、审美的全方位嬗变,文学批评和理论话语的建构也须跳脱固有的模式,甚至应该适度前瞻,以支撑、引领创作实践和美学风尚。作者傅逸尘在理论专著《“新红色经典”论》(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)中,对新时代军旅文学的新观念、新方法、新现象进行了跟踪研究,并且观察到,进入新时代,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历史再度成为作家倾心的叙事资源。不同代际、风格的作家基于对“人民史诗”与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理念的理解、认同,创作了众多革命历史和战争题材的精品力作。

《“新红色经典”论》以习主席“坚守人民立场,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”重要论述为遵循,提出新时代“人民史诗的文学”概念,并对其重要组成部分——近年来勃兴的“革命历史再叙事”现象进行再阐释;参照十七年文学“红色经典”的概念,进一步提出“新红色经典”的原创命名,以探讨新时代军旅文学如何在承续传统基础上延伸出新的叙事路径。

从1942年毛泽东同志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确立革命文艺的创作根基,到2014年习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引新时代文艺发展方向,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核心理念贯穿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,几代军旅作家作品坚守着“人民史诗”的写作伦理和精神图谱。也因此,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中,军旅文学始终占有重要地位、肩负重要使命。然而在既有的文学史叙事中,革命历史题材并没有获得与其性质、地位相称的重要位置,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,被淹没在各个时期、诸种题材的泛泛讲述中;甚至那些曾经被认定为经典的作家作品,也在各种版本的当代文学史或者精品选本中“失踪”了。傅逸尘在当代文学评论尤其是军旅文学研究领域耕耘多年,积淀深厚,对文学现场、作家作品熟稔于心。《“新红色经典”论》这部理论新著贯穿了对当代文学史脉络与新时代文学现场的梳理,展现出显明的个人风格和思想洞见。

《“新红色经典”论》对当代文学史的梳理基于一种新颖的文学史模式的构思,这种文学史构架的设想来源于作者扎实的文学批评实践。傅逸尘将“人民史诗”和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作为新时代文学的核心理念,重新梳理文学史脉络;特别是提出了“革命历史再叙事”的概念,与革命历史叙事形成了巧妙的连接,实现了形式上的前后呼

新时代红色文艺研究的理论创新

■ 蔡 媛

应。他进入文学史的深处与细部,重新从“人民史诗”的角度考察革命历史叙事,指出其在史诗性方面至今仍然活跃的文化元素;由此出发,对新时代“人民史诗”概念作出学理化阐发,辨析了新时代背景下“革命历史再叙事”在思想视野和文化自信层面取得的质的飞跃,富有创造性地界定了“新红色经典”的多维边界和外延。

在傅逸尘看来,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是一条绵延至今的悠长文脉。从“史诗性”角度来看,许多即使能够反映当时艺术水准和思想实际的作品,更像是阶段性产品,并没有真正传达出“史诗”应有的思想内核与美学气质。傅逸尘的这部分研究拓展了文学史研究的思路和方法,重新梳理了文学史经典作品的序列,更新了对这些作品的评价,并且为“新红色经典”的出场做好了文学史和思想层面的导引,彰显出文学批评实践和文学史研究之间的良性关联。

《“新红色经典”论》整合、梳理、分析文学史中已经经典化的革命历史叙事,并沿着这条脉络描绘出不同年代在创作上的变化,指出其时代特点和局限,之后提出“革命历史再叙事”的概念以及借此构建“新红色经典”的可能性。这部专著凸显新时代文学“人民史诗”及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核心理内蕴,为红色文艺研究开辟出新的理论视域与评论空间。

国防纪事

广西象州县大乐镇石朋村,静卧于大瑶山西麓。村头九胆山上,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,如沉默的守护者;山下河水潺潺,载着岁月回响穿村而过。这片三面环山的土地,既藏着灵秀山水的温润,更沉淀着厚重的红色底蕴——355国道贯通全境,一端连着外界的时代风云,一端系着村庄的峥嵘过往,既是进出大瑶山的西线要冲,更是深埋红色基因与家族温情的英雄故土。

石朋村是象州县重要的革命据点,每一寸赤土都浸润着峥嵘岁月的痕迹。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时期,韦纯束、韦章平、黎升平等革命先辈曾在此浴血奋战,将理想的火种播撒在壮乡大地。大乐街围剿战的枪声、侣塘村战斗的硝烟早已消散在时光深处,却把赤诚与担当刻进了红土肌理,也让我的家族故事与村庄的革命历程紧紧缠绕。

祖母是一位平凡却刚毅的壮族女性。当年桂中游击队驻扎村中,她毫不犹豫地接过保管武器的重任,将沉甸甸的手榴弹用粗布包裹两层,小心翼翼藏在椽子上的瓦片之间。每当夜深人静,她会悄悄搬来高凳,踮起脚托住瓦片,确认武器安然无恙才放下心来。“队伍上的同

志把命交到我手里,我拼死也要护它周全。”这份信念,让普通农妇的胸膛里撑起千钧勇气。

国民党反动派进村搜查,祖母总端着针线篮,平静地坐在门槛上用壮乡方言从容周旋。她脸上不见慌乱,手里针线穿梭如常,实则暗自绷紧神经,耳听六路、眼观八方。“越是紧要关头,越要稳得住。我慌一分,火种就险十分。”这句常挂在嘴边的话,成了化解危机的密钥。在家中排行最小的她,被游击队员亲切唤作“满婶”,这称呼里满是信赖与敬意。祖母于1983年离世,当年受她保护的游击队员专程赶来吊唁,一副挽联道尽深切哀思,那份跨越岁月的军民鱼水情永远烙印在家族记忆中。

二祖父是游击队里出了名的“铁脚板交通员”。无论风雨暗夜还是烈日白昼,他常背着装满热饭的竹篮在崎岖山路疾行。草鞋被尖石磨破,就用布条简单缠裹;露水打湿裤脚,顾不上拧干便继续前行。竹篮里的饭菜是队员们的补给,夹层中藏着的纸条是关乎生死的情报,每一次出行都是与危险的较量,他用一双“铁脚板”在崇山峻岭间踏出了支援革命的生命线。

三伯父、四伯父少年时代便胸怀壮志,手握长枪加入民兵队伍,与游击队员并肩作战。四伯父在中平镇江西村剿匪战斗中不幸负伤,敌人的子弹从他左手掌心穿过,鲜血一点一滴渗进红土。

家族的热血与村寨的忠魂,早已融进石朋村红壤里。最庄严的见证,便是村头九胆山上的烈士纪念碑,这里长眠着张兆树、陆贵兴、李锡振等9位烈士。剿匪战斗中,他们或为掩护战友突围挺身而出,或搜捕残敌时遭遇伏击,或转运伤员途中不幸遇难,生命定格在最美好的年华。每逢清明,乡亲们会带着自酿米酒和鲜花前来祭奠。我每次返乡,上山瞻仰先烈、擦拭墓碑,指尖触过冰凉碑石,仿佛还能感受到先辈们未曾冷却的热血。

命运的安排如此奇妙。多年后,我有幸在柳州军分区开启军旅生涯,后借调到机关从事新闻宣传和志书、年鉴编纂工作。2010年,我受筹筹建荣誉馆的任务。整理泛黄的阵中档案时,一页烈士名录紧紧抓住了我的目光——张兆树、陆贵兴、李锡振……那些童年时耳熟能详的名字,竟真切地出现在眼前。时间仿佛凝固,窗外工地的喧嚣瞬间退去,我的耳畔响起九胆山的松涛,眼前浮现祖母摩挲过的手榴弹,手心仿佛感受到二祖父跋涉过的山风。

我以先辈为榜样,奋战近年牵头建成荣誉馆。英烈墙上,家乡的9位烈士与其他500余位英灵的名字并列,无声诉说着峥嵘岁月。

这份血脉里的召唤,成了我此生不渝的追随。30年笔耕不辍,对我而言早已不只是工作,更是一场漫长的朝圣。

我的文字记录过军队帮扶乡亲脱贫的历程,见证过村庄的蝶变;我的镜头定格过洪灾现场战士们躬身如桥的迷彩脊背,那托举生命的瞬间,激荡起千万人的情感巨浪。走上军分区交流台,我的发言更像是对先辈的隔空汇报,而获得的荣誉褒奖,早已沉淀为生命的底色。

如今的石朋村,水泥路上常有身着迷彩服的研学少年,围着老者倾听祖母守护武器的故事。韦章平同志故居内,他们在老物件前驻足聆听。红色广场的标语被阳光映照得格外明亮,每一个字都在诉说过往;村里的老党员用质朴的方言直播革命故事,让红色记忆在云端传递。每年,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这里感受红色文化浸润,九胆山上的松柏又添新纹,旧年轮藏着过往,新生长孕育希望。

返乡时,我仍会攀上山顶,指尖轻轻拂过碑石上的名字,如同当年在荣誉馆轻触档案里的烈士姓名一样。原来,红色传承从不是抽象口号,它是祖母“稳得住”的眼神,是二祖父踏遍山路的草鞋,是先辈们把赤诚刻进土地的热忱,更是后来者从红土里汲取向上生长的力量。

风又吹过九胆山,松涛依旧。这红土上的故事,会随穿过村庄的河水汨汨奔涌,伴袅袅炊烟岁岁生长;而我笔底的文字,永远是写给故乡与先辈的信,字里行间,都是血脉里不曾褪色的红色印记。

一瓣心香

榴花灼灼,荷风送香。西渭河的流水载着夏日的温润,汤店村的茶树竹影在微风里摇曳生姿。当驻村的日历翻到最后一页,意味着我要与这片浸润汗水与深情的土地告别了。两年驻村时光,让我从一个异乡客长成汤店村的儿女,让脚下的泥土成为生命里厚重、温暖的记忆。

2024年6月,作为一名退役军人,我被组织上选派为安徽省第九批驻村干部,到金寨县青山镇汤店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。村庄藏在大别山的褶皱里,那时有些村组道路还是坑洼的石子路,给村民劳动生产、日常出行带来不便。我与村两委干部一起走田埂、进农家、访农家,听乡亲们唠家长里短、说急难愁盼。我深知,驻村不是匆匆过客的历练,更不是蜻蜓点水的打卡,而是要把为民服务的赤诚情怀深

深扎进这片泥土,用实干与担当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期盼。

汤店村有青山绿水,有“茶竹药蔬”产业,守着这般“金疙瘩”,绝不能过躺平的日子。我们锚定“党建+产业”的思路,盘活闲置资产。从茶叶飘香到竹韵悠长,从石斛吐翠到蔬果满筐,“茶竹药蔬”四大产业渐成规模,乡亲们的腰包越来越鼓,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。

汤店村是大别山区一个传统的村落,村域面积30.86平方公里,山高路远,群众居住分散,夜晚摸黑出行,点亮山路一直是群众的期盼。我与村两委干部积极对接帮扶单位,争取到400盏太阳能路灯。如今夜幕降临,一盏盏路灯如繁星洒落,照亮村路。乡亲们晚上能散步,闲暇时能跳跳广场舞,像城里人一样惬意。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,我们多方奔走,争取资金与项目,让水泥路通到家家户户门前。曾经杂物堆积的角落,如今花红草绿、曲径通幽;曾经污水横流的沟渠,如今

清水潺潺,鱼戏其间。

把根扎进泥土,才能看见花开。我记得老党员李成建主动投身村庄建设,谈及在家门口务工的日子,他说“既能顾家又能增收”时的满足之情;我记得村民唐风勤看着亮起来的太阳能路灯,笑容满面地说“咱们也能像城里人一样晚上散步”;我记得棚草家庭农场丰收时节,乡亲们在大棚里忙碌的身影和脸上洋溢的喜悦;我记得村晚舞台上,《幸福汤店》的歌声响起时,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这些温暖的瞬间,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乡亲们待我如亲人,一句简单的“程书记辛苦了”,足化解我奔波中所有的疲惫。两年驻村时光,让我更加明白“扎根基层、服务群众”的意义,也让我收获真挚的情感、宝贵的成长。

心系汤店,情牵乡亲。不论身处何方,我都愿做汤店村忠实的守望者,看它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,一路繁花似锦、光芒万丈。



风雨同舟(剪纸)

王洪生 刘松柏作